

反思加州大学停用标准化考试——高教政策制定应以“数据驱动”为基石

■寇煜照 秦春华

当地时间11月18日,美国加州大学总校长布朗在董事会议上宣布,加州大学将不再使用任何标准化考试成绩作为招生选拔录取依据,并且拒绝任何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ACT)替代方案。该表态为加州大学持续3年的标准化考试存废之争画上了句号。作为最负盛名的公立大学系统与SAT/ACT等标准化考试的最大用户,加州大学的这一决定势必对美国高校招生政策走向产生深刻影响。

历时三年的存废之争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加州大学的标准化考试存废之争在2018年就拉开了帷幕,在经历了疫情冲击、内部分歧、司法诉讼、寻找替代考试未果等波折后,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2018年8月,加州大学时任校长纳波利塔诺请求学术评议会评估标准化考试的使用情况,并就是否调整招生政策提出建议。2020年1月,学术评议会基于数据分析研究后得出结论——加州大学的招生录取充分考虑了弱势学生的考试成绩劣势,SAT也能有效预测大学表现,不建议实施可免试入学政策(即允许申请人不提交SAT/ACT成绩的招生政策)。

然而,2020年3月以来,新冠疫情的蔓延导致SAT/ACT大面积取消,加州大学决定2021年度临时实行可免试入学政策。在此情况下,纳波利塔诺向董事会呈交了一份与学术评议会建议大相径庭的政策提案,建议2021—2022年度实行可免试入学,2023—2024年度不参考标准化考试成绩。同时,启动自行开发标准化考试的可行性评估。如果可行,将于2025年启用新考试,否则继续沿用2024年度的入学政策。

这份提案招致了学术评议会的激烈反对。部分支持学术评议会的董事甚至提出动议要求搁置校长的改革,但该动议遭到了否决。之后,董事会全票通过了该提案,决定在加州大学逐步停用SAT与ACT。

当加州大学内部分歧严重时,2019年12月,代表少数族裔与弱势群体的民权组织向加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加州大学使用SAT/ACT的行为构成歧视。2020年8月,法院颁布禁令,要求加州大学停止以任何形式使用两项考试,停考的时间表进一步提前至2021年度。

今年1月,加州大学经评估后,认定不具备于2025年启用新考试的可行性;10月,使用“智能平衡测试”(加州公立高中11年级的统一评估考试)的替代方案也被否决。至此,加州大学最终形成了当前停用各类标准化考试的决定。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加州大学决策的双重背景

加州大学的可免试入学政策有着极为复杂的背景。一是SAT/ACT内在的公平性问题导致可免试入学政策在美国高校间迅猛发展;二是美国在废除《平权法案》后,少数族裔入学会机锐减。这些全部和大学招生的公平性直接相关。

2001年,一项出自加州大学的研究震惊全美——高中成绩才是预测大学表现的最佳指标,所谓考查“学术倾向”的SAT完全没有预测价值,充其量只能反映家庭经济实力。美国社会对于“智商测试”(SAT的前身)歧视黑人的历史素有不满,这份研究再度点燃了公众质疑。

此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少数族裔与贫困学生的SAT/ACT成绩普遍偏低,而SAT的试题也有偏袒中上层、歧视少数族裔的嫌疑。尽管这些研究结果还远未成为共识(同时有其他研究证明了SAT的预测有效性),但就像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后一样,越来越多的人基于实证研究结果开始相信,标准化考试不但没有实现他们所称颂的科学价值,反而加剧了社会不公。

这一点直接催生了一股美国大学可免试入学政策的潮流。2005年以来,该政策日益得到美国文理学院、私立高校的青睐。越来越多的高校发现,可免试入学政策既能吸引更多弱势学生申请,彰显学校的选才理念和公平正义,又没有导致生源质量的下降。芝加哥大学更是在2018年成为首个宣布实施可免试入学政策的顶尖研究型大学。在这种潮流

下,一向颇具先锋意识的加州大学也希望成为美国大学中捍卫招生公平、促进多元化录取的表率。

另一个重要背景则是《平权法案》废除后的影响。《平权法案》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最早由美国时任总统肯尼迪签署。该法案旨在减少在雇佣招聘员工过程中因为求职者的种族、肤色、国际、性别等因素而造成的歧视与不公。2003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批准了高等教育机构可以根据《平权法案》,在大学招生录取工作中将种族因素纳入录取考量。

1996年,共和党主导的加州废除了加州大学旨在提升少数族裔教育机会的《平权法案》招生政策,导致加州弱势少数族裔升入加州大学的机会锐减。1995年,弱势族裔学生占加州高中毕业生的38%,占加州大学新生的21%,差额为17个百分点;这一差额在2010年、2019年分别上升至28个和33个百分点。2014年和2020年,加州民主党曾两次试图恢复《平权法案》,最终均宣告失败。

上述因素共同导致SAT/ACT成为众矢之的。在2020年5月的决策中,加州大学董事会时任主席佩雷兹认为,“加州大学强化录取结果的权益平等已迫在眉睫”。现任主席埃斯塔诺日前则自豪地指出:“加州大学停用标准化考试的决定一定会引起全美的反响。”

当然,在美国当前特殊的社会环境下,相关决定亦不乏党派政治的色彩。停用标准化考试符合少数族裔利益,必然会进入民主党的政治议程。可免试入学政策的支持者屡屡强调平等权益、开放可及等体现民主党“政治

正确”的价值导向,纳波利塔诺、佩雷兹等关键人物更是民主党资深人士;而一些偏向共和党的社会团体则谴责加州大学破坏了按能选才的教育选拔原则。

公平:大学招生的永恒主题

加州大学关于标准化考试的存废之争一方面充分说明了公平性是大学招生选拔制度的永恒主题,另一方面也应特别关注其“数据驱动”下的决策历程。

当前,教育公平是全球各主要国家大学招生政策着重突出的价值导向。21世纪以来,美国社会对于SAT/ACT公平性的讨伐愈演愈烈,同时,对顶尖名校日益成为阶层固化的工具深感不满。2019年,美国部分名校的“校内招生丑闻”再度令公众哗然。此外,可免试入学的招生实践与研究又纷纷说明,标准化考试并没有像他们宣称的那样有助于选拔优秀生源。

尤其对于加州大学而言,当《平权法案》长期无法恢复时,单凭标准化考试已经远不能实现兼顾公平与卓越的招生政策目标,早已成为众矢之的的SAT/ACT甚至沦为党派政治的操纵对象。当前,SAT/ACT的公平问题突出,预测能力差,是加州大学与美国其他高校纷纷将其停用的直接原因。SAT与ACT或就此离开美国大学招生的舞台。

由此可见,教育公平是大学招生政策的公信力基础,凝聚着社会对于教育选拔制度的基本共识。然而,弱势学生因为所能获得的教育资源有限,不可避免会在考试评价中处于劣势,这就需要相应政策予以调整。

另一方面,美国学界围绕SAT与ACT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这些科学严谨的实证研究,成为了教育政策制定的重要基石。每一项严肃的教育政策背后都有相关实证研究做支撑,而不是“拍脑袋”的结果。

尽管加州大学在2020年5月的决策中没有采纳学术评议会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但校长与学术评议会均认同应当通过“数据驱动”完成决策,并分别援引相关研究佐证己方论点。加州大学在系列决策中也要求学校相关部门持续监测生源质量,实时评估政策效果。

此外,先前加入可免试入学政策行列的伊萨卡学院、维克森林大学等高校也均是在完成针对本校的招生政策的院校研究,证实了可免试入学政策的积极效应后才作出相关决定。“数据驱动”的实证研究成为政策制定、公共舆论辩论的基础,已成为美国社会的共识,这一点尤其值得我国借鉴。

(作者分别为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有感而发

近日,一则高校教师布置作业的视频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从视频中看到,老师给学生们留了一份特别的作业——要求学生们找到周杰伦、郎平等名人的联系方式。

在解释这份作业时,当事老师称其主要是为了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因为该专业的学生未来就业方向多为记者。作为媒体记者,寻找被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本身就是基本功。

这一理由看似很有道理,而且也能“创新”留作业的方式,想必也能激发学生们的“完成作业”的热情,对学生专业能力也会产生一定的锻炼效果。几方考虑下来,似乎这是一份颇为不错的教学创意。

然而,如果我们将视角放到社会层面,却总觉得哪里不对。

作为公众人物,如周杰伦、郎平等当然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属性,但诸如联系方式这样的信息依然属于私人信息。在未被允许的前提下,将别人的私人信息用于课程教学这种具有公共属性的行为中是否合适,相信不难判断。

当然,正如授课教师所说,最终能否找到名人的联系方式并非该份作业的考查重点,其重点是锻炼学生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掌握新媒体的技能。话虽如此,但问题的实质并未改变——在学生完成作业的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与“名人”有关的个人或机构,而且由于学生能想到的手段不多,这种影响很可能是重复的,这是否会导致某些机构和个人不胜其扰,不得而知。

必须强调,对于教师在课堂上创新教学方式的行为,本人是非常赞赏的,但这种创新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能对周边环境和人群造成太多影响。这一点在高等教育与社会紧密接触的当下显得越来越重要。当然,在任何与社会接触的教学中,这种影响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如何将其置于一个可控且正面的范围内,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高教观澜

企业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尚待破除壁垒

■阙明坤

近年来,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始终是国家高等教育的重点关注内容。尤其在今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出,鼓励上市公司、行业龙头企业举办职业教育,鼓励各类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这一内容更是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

随着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企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主阵地,其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将作为一种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最典型的特征是校企双主体办学的跨界教育。因此,行业企业也就成为了职业教育的重要办学主体,如若离开企业的支持,职业教育就沦为自说自话,脱离真实产业需求和职业场景。

长期以来,受制于政策环境和办学惯性影响,企业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困难重重,要么是“雷声大雨点小”,要么是“一热一冷”,导致企业难以改变配角身份,无法从边缘走向舞台中心,变成与职业院校并驾齐驱的重要办学主体。究其原因,关键还在于政策落地存在困难。

近年来,我国在国家层面紧锣密鼓地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为企业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创造良好政策环境。譬如,《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年)》提出“支持国有企业和大型民营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这

一系列利好消息,让产业界看到了希望。一分规划,九分落实。如何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作用,调动上市公司、龙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积极性,还需要进一步健全相关政策体系,破除各种隐性壁垒。

首先,落实民营企业创办职业院校的同等地位。当前,民营企业和个人投资举办的民办高职有340所、中职1985所,其中不乏吉利、格力、碧桂园等大型民营企业创办的职业院校。民办职业院校主动与中小企业开展合作,培养了一大批技术技能型人才。但这些院校与公办职业院校在政策上存在较大落差,有的面临生源危机。

对此,应进一步明确政府部门职责,加快建立市县级层面民办教育、职业教育联席会议制度,在土地、过户、税费等方面依法给予优惠。要支持其提升办学水平,在项目申报上给予适当倾斜,保障民办教师和公办教师具有同等地位。唯有如此,才能调动企业参与举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其次,应支持国有企业依法举办职业教育。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曾经是举办职业教育的骨干力量。然而,随着国企改革的推进,国有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占比大幅下降。如今,国有企业举办职业教育重新受到重视。目前全国共有国企创办的公办高职院校76所,但同样面临着资金缺乏保障、融资核算渠道不畅、教师待遇不平等等诸多问题。

对此,应发挥国企的龙头带动作用,支持其举办职业教育,培养产业人才大军。一方面要建立多元筹资渠道。尚未明确国企举办的高职拨款标准的省份,应尽快落实生均经费拨款,确保公共财政拨款有效覆盖。另一方面,则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比如加快修订《职业教育法》,支持国有企业办学;修改国资委对国有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考核办法,在政策、人员、经费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保障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合作的合法性。据调查,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并不高,根源在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责权利不对等,企业利益没有得到保障。企业调查显示,在制约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积极性的因素中,62.32%的受访者表示“企业因参与人才培养的经济损失得不到补偿”。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配套机制尚不完善,导致参与积极性降低。

对此,要建立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成本补偿机制,积极扶持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政府对接纳学生实习的企业予以经费补助,通过税收优惠等方式调动企业积极性。明确大型企业承担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义务,大力培养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组合式激励。

特别是近年来,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在国内方兴未艾,山东、江西等省也正在加快探索,但是仍然面临一些瓶颈难题,对此更需进一步明确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收益分配、合作协议、资源投入、设立程序、退出机制等。

总之,正如著名教育家黄炎培所言,“办职业学校的,须同时和一切教育界、职业界努力地沟通和联络”“把教育和实业连为一体”,只有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创造性,才能构建职业教育多元化办学格局,建设技能型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作者系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以下简称“三全育人”)是高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的有效路径,高校可以通过整合教育资源,分层次、有步骤地落实到教育的每一个环节。

从三个层面着手

“全员育人”就是以学生为中心、所有教职员均承担思政教育责任的思政教育模式,意味着没有旁观者,人人都应该参与到立德树人的过程中来。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又可以从三个层面着手。

第一层面的教育主体是专任教师,包括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辅导员、本科生班主任和研究生导师。思政教师要践行“六要”标准,遵循“八个相统一”,不断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专业课教师要不断提升“课程思政”意识和能力,将思政教育融入专业课;辅导员、本科生班主任和研究生导师与学生接触时间最长、最为密切,在日常生活学习的关心指导下开展思政教育最容易被学生接受。

第二层面的教育主体是参与学校教育管理服务的教职工,高校学工、教务等机关部门,以及各学院办公室的教职工。他们同样属于思政教育力量,通过严格的管理、暖心的服务以及策划、组织有吸引力的活动,可以达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第三层面的教育主体是后勤人员。学生在校园内的学习生活离不开后勤人员,高校应通过后勤人员努力打造“家”文化,让思政教育在学生学习与生活点滴中体现。

三个层面的教育主体在各自业务范畴内向学生都牢固树立“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积极承担思政教育职责,切实实现全员育人。

在三个课堂下功夫

“全方位育人”是以思政教育为主题,第一课堂、第二课堂、第三课堂实现互联、互通、互补的全方位思政教育。三个课堂均需下功夫。

第一课堂是思政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发挥作用的舞台。思政政治理论课提升思政教育亲和力与针对性,其他各门课程与思政政治理论课加强协同。任课教师要持续加强以课程教学改革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守好主阵地。

第二课堂是学生课外参加的相关主题教育、实践锻炼、志愿服务等活动,可以通过“学者讲思政理论、领导讲当前时政热点、学科带头人讲专业报国精神、校友讲亲身实践感悟、优秀学长讲成长经验”等几个维度来开展思政教育,增强教育的有效性和吸引力。

第三课堂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无限大的网络课堂。网络课堂要遵循思政教育和互联网的双重规律,不断拓展网络思政空间,增强网络思政实效,高校要通过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推出高水平的思政教育网上课程,用学生喜欢的话语讲述思政教育有关内容,牢牢抓住网上思政教育阵地。

上述三个课堂互相补充、同向同行,推动思政教育工作的纵向贯通和横向联通,进而形成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全方位思政教育。

实现三个阶段的衔接

“全过程育人”是学生从入校到毕业整个受教育过程,通过入学教育、在校教育和毕业教育三个阶段紧密衔接,形成全过程思政教育模式。

一是入学教育。大一新生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期,抓好这一时期的思政教育对个人健康成长尤其重要,要通过开展理想信念、纪律观念、心理健康等多主题的入学教育活动,使学生尽快适应大学生活,树立奋斗目标。

二是在校教育。除了三个层面的教育主体利用好三个课堂对学生开展思政教育外,还要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方面要抓好党、团支部建设,通过党、团支部“三会一课”可以从组织形式上保障思政教育落实到位;另一方面要加强本科生班级和研究生课题组管理,本科生班级和研究生课题组是本科生和研究生与同学彼此接触最紧密的团体,通过加强班风和课题组建设,有助于提升全体学生的思想认识。

三是毕业教育。通过开展主题活动引导学生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发展、民族命运结合起来,争做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入学教育、在校教育和毕业教育之间既有时间段的明确界限又有教育内容的重叠,通过三个阶段教育的密切实施,实现学生上学期间无空档全过程思政教育。

除此之外,要落实好“三全育人”思政教育工作,还要注意做好以下三个重点工作。一是要将思政教育与学校各项工作统筹推进,强化统一领导、统一部署,着力实现思政教育目标统一、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增强思政教育工作的合力。二是要进一步加强教职工的思政教育意识和能力培养,针对不同身份教职工的特点和差异,设计、安排不同类型的教育培训,使其有能力担负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三是要加强思政教育过程及实效的考核,使思政教育参与情况及育人实效成为教职工考核的必要要素,充分发挥考核的指挥棒导向作用,促进“三全育人”思政教育落到实处。

(作者系西北工业大学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三全育人』须涵盖教育每个环节

■邱若娟